【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居民消费问题的研究进展及政策启示*

邓仲良 袁诗玘

摘 要：大力提振消费是“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立足当前居民消费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和挑战，本文从增收、减负、保障、供给四个方面，系统回顾了国内外居民消费的研究脉络和最新进展。总体来看，劳动报酬与收入分配、时间约束和财政税收等影响居民的基础消费能力，住房等债务、房价预期变化等因素将影响家庭有效购买力。在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结构转变趋势下，从医疗、养老、失业和长期护理等需求变化来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显著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提升居民消费预期。伴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增强数字普惠金融可及性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均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消费便利性；同时，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还培育了新的消费场景，通过增加消费供给来放大潜在市场规模效应。故居民消费不足，不是简单的购买力不足或消费意愿低迷的问题，而是收入分配、债务压力、风险预期、人口结构和消费供给适配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政策启示和未来可供深化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居民消费；扩大内需；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费供给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5-0148-13 **收稿日期**：2026-07-3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促进人口流动与城乡要素一体化协调的户籍制度研究”(21BJL090)；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4年度重点项目“新发展格局下统筹内生创新和应对外部冲击的政策框架：理论和经验”(2024XYZD02)。

作者简介：邓仲良，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 100732)。

袁诗玘，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生(北京 102488)。

一、引言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扩大内需，尤其是提振居民消费，已成为应对外部冲击、保障经济安全的长远战略之举。《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①]提到，“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居民消费优化升级，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相结合，蕴含着巨大增长空间”“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及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稿进一步围绕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大力提振消费作出系统工作部署。从现实来看，尽管中国居民收入总体稳步增长，但居民消费意愿偏弱、居民消费率偏低、消费升级受阻、消费环境不完善等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当前，在经济转型升级和以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居民消费不振已成为制约内需壮大的关键因素[②]。收入是提振消费的重要前提，但仅从购买力不足或消费意愿低迷进行解释，难以全面准确地揭示居民消费问题的本质。不同年龄、收入等个体异质性、家庭负债引起的消费制约机制以及住房等家庭财富变化导致的家庭资产负债表“扩表”或“缩表”等都会

影响居民消费。与此同时，老龄化、少子化与家庭小型化持续影响消费需求结构，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与新兴消费场景也在不断改变居民消费形式。可见，居民消费偏弱并非简单的需求收缩，而是收入约束、债务压力、风险预期与供需错配共同叠加的结构性结果。基于此，本文围绕居民消费问题系统总结国内外研究文献，以期厘清研究脉络，为相关政策提供系统理论支撑。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居民消费问题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和经验证据。传统消费理论多从收入、财富、利率及生命周期维度阐释家庭消费行为，主要聚焦收入、流动性约束与预防性储蓄的跨期决策逻辑（Modigliani et al.，1954）。近年来，相关研究进一步拓展至收入分配（白重恩等，2009）、住房财富效应（Waxman et al.，2020；孟宪春，2023）、社会保障（周广肃等，2020；Kekre，2023）、人口结构变化（De Nardi et al.，2010；陈武元等，2024）、数字经济（林晨等，2020；刘向东等，2025）、物流等交通成本（Allen et al.，2022）及城市空间与居民消费（彭冲等，2023；邓慧慧等，2024）等领域。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提高居民收入是扩大消费的基础。由经典消费理论可知，消费支出受相对收入、收入预期和持久性收入影响；家庭债务会降低有效购买力，削弱收入提升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面对医疗、养老、失业等家庭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居民也会增加储蓄，进而降低当期消费。对人口结构变动引起的内在消费需求变化及新技术进步产生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消费场景，服务消费、消费质量及适应消费升级的消费供给将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更加复杂的影响。可知，增收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减负释放居民有效购买力，保障能够稳定消费预期，消费供给改善则满足消费需求。但从已有研究看，现有文献大多聚焦单一政策工具或分析维度，对居民消费约束背后的理论逻辑缺乏系统性的全局审视。

基于此，本文从消费能力、消费约束、消费保障和消费供给四个维度，构建一个“增收—减负—保障—供给”的分析框架，对提振居民消费的主要研究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其中，“增收”主要从收入分配优化、劳动收入提升与财税调节等方面总结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相关文献；围绕家庭住房杠杆、债务压力与资产负债表修复，“减负”领域主要聚焦消费面临的现实约束；“保障”层面的相关研究则关注社会保障从基础兜底转向风险分担和消费释放效应以及人口结构转变背景下的社会保障需求；围绕数字经济、城市空间与场景创新、人口转变等对消费的影响，相关研究进一步探讨供给升级如何催生新消费需求和优化消费体验。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一是立足“增收—减负—保障—供给”，从收入分配、家庭债务负担、社会保障与消费供给四个领域建立了一个影响居民消费的统一分析框架，并总结国际经验事实，避免单一视角研究不足。二是立足中国现实问题，聚焦收入分配格局、房贷压力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差异、人口转变及供给结构变化等影响居民消费的长期因素，本文系统梳理相关国内外研究进展，为理解居民消费不足的深层机制提供文献基础。三是进一步梳理了现有研究脉络，通过识别居民消费领域的研究缺口，为后续居民消费问题研究提供可拓展和深化的研究方向。

二、增收：收入与消费能力

国内外研究主要从收入水平与消费倾向、劳动收入份额与收入分配、财政税收政策三个方面系统探讨了提振居民消费的“增收”路径。

1.收入水平与消费倾向

收入是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前提，但收入增长能否形成有效需求，还取决于分配格局和不同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水平与消费倾向之间的关系最早可追溯至绝对收入假说，当期收入决定当期消费，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提高而递减，由此构成收入影响消费的基本逻辑（Keynes，1936）。但居民消费决策不仅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还受相对收入地位和消费习惯影响。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强调，居民消费行为受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影响，具有社会参照性、黏性和向下调整不完全特征（Duesenberry，1949）。另外，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进一步揭示了消费决策的跨期属性，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需求和消费预期存在显著差异，居民可基于持久收入预期和整个生命周期的资源禀赋进行跨期配置，故临时性收入冲击往往被转化为储蓄而非消费（Modigliani et al.，1954；Friedman，1957）。综上，收入虽是消费扩张的根本基础，但收入影响消费的传导路径受收入分配格局、收入预期稳定性和家庭风险承担能力等因素的制约。

从中国经验研究来看，收入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格局深刻影响“增收促消费”的传导机制。由于不同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存在显著差异，收入差距扩大意味着收入更多流向边际消费倾向较低的高收入群体，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若收入占比较低，会抑制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整体社会消费率的提升（方福前，2009）。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水平间呈倒“U”型关系，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不确定性引起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强，高收入群体的消费趋于饱和而储蓄倾向更高，那么，收入差距扩大会抑制总消费需求，因而缩小收入差距、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能够有效提振居民消费（杨汝岱等，2007）。另外，城镇化推动劳动力由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流向高效率的非农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为居民消费扩张创造收入基础，因而推进城镇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收入差距对消费的抑制效应。同时，推进城镇化还可扩大就业机会、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及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有利于稳定流动人口的长期收入预期并释放消费潜力（雷潇雨等，2014）。综上所述，统筹推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与提升城镇化质量，能够为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提供可持续的微观基础与制度保障。

2. 劳动收入份额与收入分配

从功能性收入分配视角看，工资收入与资本收入对应的消费倾向存在差异，劳动收入份额提高能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和改善居民部门收入基础来扩大消费需求。从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和居民消费率均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见表1）。2004—2023年中国居民部门及非营利机构消费率均值为37.67%，显著低于美国等高消费率组的63.37%，同时，也低于中消费率组的55.80%和低消费率组的48.87%。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均值为51.33%，也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存在一定差距。不同组别之间的比较也进一步表明，较高的劳动收入份额与较高的居民消费率并非完全对应。尽管表1中高消费率组和中消费率组的居民部门及非营利机构的消费率存在明显差异，但二者劳动收入份额几乎相同；低消费率组的劳动收入份额与前两组的差距也并不悬殊。相关研究进一步证实，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对总需求的净效应还取决于投资、外需和利润分配等结构性条件（Bhaduri et al.，1990）。对中国而言，居民消费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宏观总量上的对应关系，但也受家庭收入结构影响。本文进一步利用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CFPS家庭数据展开特征事实分析。由图1可知，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收入来源存在明显差异。低收入家庭中转移净收入占比较高，而其工资性收入占比相对较低；随着家庭总收入水平提高，工资性收入占比明显上升，逐步成为中高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另外，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消费支出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工资性收入主导家庭和经营净收入主导家庭在中高收入组中表现出较高消费水平（见图2）。

表1 2004—2023年部分国家居民部门及非营利机构的消费率分组与劳动收入份额

组别	国家	居民部门及非营利机构平均消费率（%）	平均劳动收入份额（%）
高消费率组	美国、英国、意大利	63.37	58.14
中消费率组	印度、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	55.80	58.15
低消费率组	法国、德国、韩国、新加坡	48.87	56.40
中国		37.67	51.33

数据来源：2004—2023年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国际劳工组织ILO数据库，提取时间为2026年7月1日。

从实际情况看，劳动收入份额刻画的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分配关系，并不等同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则会从源头上削弱居民消费能力（方福前，2009）。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资本密集型产业扩张使经济增加值更多流向资本所有者和政府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则会挤压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空间（白重恩等，2009），若再分配环节不能有效弥补初次分配缺口，特别是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结构未能充分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则将进一步弱化居民的消费能力。因此，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意义在于使更多收入流向边际消费倾向更高的劳动者群体，从源头改善消费的初次分配基础；同时，通过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和福利制度等再分配政策，推动更多国民收入向家庭部门尤其是中低收入劳动者倾斜（杨汝岱等，2007）。

另外，劳动供给时间是家庭增收的内生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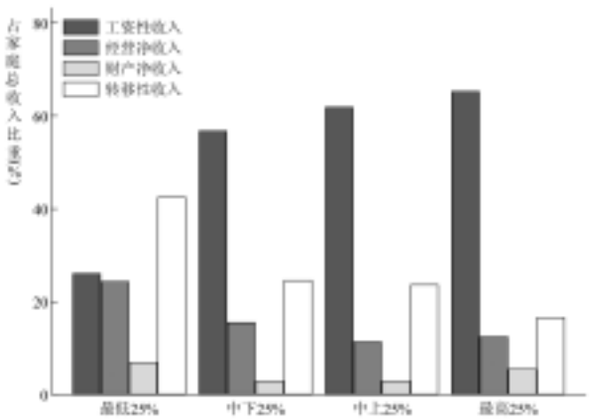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收入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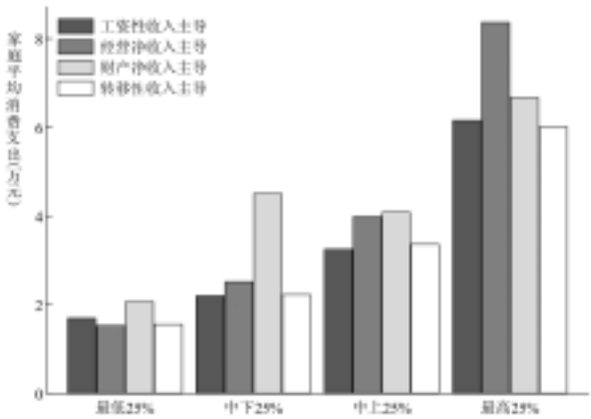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消费支出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CFPS数据整理计算，本文CFPS家庭样本为非平衡面板，包括新增或退出调查的家庭样本，家庭收入主导类型按照家庭四类收入中金额占比最大来划分。

但劳动收入影响消费的传导机制还取决于劳动时间配置。Becker（1965）将时间约束纳入家庭消费决策框架，指出任何消费活动都需要相应的时间投入才能完成，但从时间配置视角看，居民总时间资源有限，工作时间延长必然压缩闲暇时间，进而改变消费方式和消费结构。从长期来看，过长的劳动时间还会对劳动者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削弱家庭长期劳动参与能力和消费能力。此外，工时延长、闲暇时间减少会降低休闲娱乐类消费的边际效用（Blundell et al.，2016），抑制发展型消费（刘娜等，2025）。

3.财政税收政策

相较于由金融中介、资产价格和信贷条件发挥作用的结构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够通过税收调整、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支出，更为直接地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支出结构和消费预期，因而在扩大居民消费的方面具有更强的政策操作性（王曦等，2024）。然而从已有研究来看，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一方面，财政支出扩张通过增加总需求、改善就业与收入预期，产生替代效应或预期效应，拉动居民消费；但另一方面，当期政府税收或债务偿还会通过负财富效应压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预期，进而抑制居民消费。相关研究进一步表明，财政支出扩张对居民消费的最终影响不仅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弱，还依赖货币政策如何配合（Davig et al.，2011）以及财政扩张本身的力度是否处于合理区间。

从税收政策看，相关中国经验研究表明，中国2011年个税改革通过大幅提高费用扣除额显著增加了工薪阶层可支配收入，促进了居民消费（徐润等，2015）。2018—2019年，新一轮个税改革在进一步提高费用扣除额的基础上，引入六项专项附加扣除（2022年新增第七项婴幼儿照护扣除），降低了居民家庭在教育、养老、医疗、住房和育儿等方面的刚性支出压力，改善了家庭支出结构与未来预期并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总量（翟光宇等，2025）。但相关研究也表明，个税改革的消费效应存在较强异质性。单纯提高个税扣除额会在城乡内部形成累退性效应，使高收入群体收益更大，税收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异质性影响会加剧收入分化，进而导致消费分化（Saez et al.，2012）。同时，专项附加扣除采取税前扣除的方式，实际收益与边际税率挂钩，使高收入群体可获得更大减税收益，部分中低收入群体因应纳税额较低而难以充分享受政策红利（范子英等，2026）。从已有研究结论看，个税改革的促消费效应较为明确，但其分配效果仍存在不同认识。不同研究的考察期限、样本对象和税收冲击测度会影响消费效应的估计，纳税门槛、应税收入和扣除方式也会影响不同群体的减税收益。因此，个人所得税改革还应重点考虑不同收入群体的收益差异及其分配效应，在优化扣除标准和专项附加扣除制度设计的同时，增强政策精准性识别，更加惠及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群体。总体来看，劳动收入增长、收入分配改善和财税调节能够夯实居民消费能力，但住房债务等刚性支出仍会压缩家庭预算，增收效应的充分释放还需要居民负担得到有效缓解。

三、减负：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

家庭债务是影响家庭资产负债表稳健性和消费可持续性的关键变量。近期国内外研究主要从家庭债务杠杆转变与债务风险、住房财富效应与消费挤出两个维度分别分析如何缓解债务对居民消费的约束。

1. 家庭债务与消费

关于家庭债务与消费关系的理论认识，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都认为，家庭会依据终身收入安排储蓄、借贷与消费，故适度负债具有缓解短期流动性不足、平滑生命周期消费的功能（Modigliani et al.，1954；Friedman，1957）。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理性预期，随机游走假说认为在完美信贷市场和理性预期下，消费近似随机游走，仅有不可预期的因素才会改变消费路径（Hall，1978）。这表明，当消费支出随当期收入存在明显波动或家庭受到借贷限制、缺乏流动性资产时，居民消费支出会面临流动性约束。

从微观机制看，债务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取决于家庭的资产负债结构与流动性状况。当家庭持有更大比重的住房等高价值非流动资产时，面对收入波动和意外经济冲击，家庭消费支出将会呈现较强敏感性（Kaplan et al.，2014），其中，高杠杆、低流动性家庭受债务约束更为突出，债务负担促使家庭大幅削减消费支出（姚健等，2022）。对中国而言，债务约束尤其是住房债务，是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住房债务相较于一般性负债规模更大、期限更长，具有定时、定期的刚性约束特征，对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更直接且持久。本文仍利用CFPS数据考察中国家庭的债务结构（见表2）。对有债务家庭，住房相关债务占全部债务金额的61.67%，明显高于银行债务、亲友社会债务及其他类型债务，是家庭债务主要来源。从家庭覆盖面和平均债务规模看，48.36%的有债务家庭存在住房相关债务。考虑债务对支出影响，由表3列（1）—（3）可知，家庭总收入对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总债务收入比的系数虽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总债务负担与家庭消费间尚未呈现稳定的负向关系。当仅考察住房债务时，住房债务收入比显著抑制家庭消费支出，这表明住房债务对家庭消费的约束更为突出。

表2 有债务家庭的债务结构

债务类型	金额占比（%）	有该类债务家庭占比（%）
住房相关债务	61.67	48.36
银行债务	11.54	21.00
亲友社会债务	9.40	27.47
其他类型债务	17.39	39.29

数据来源：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CFPS数据。

注：住房相关债务包括房贷及装修债务，亲友社会包括亲友债务和民间债务；另外，各类有债务家庭占比为有该类债务家庭的数量占所有债务家庭的比重，因同一家庭可同时有多类债务，所以占比加起来超过100%。

表3 收入增长、债务约束与家庭消费支出

	家庭人均消费支出		
	（1）	（2）	（3）
家庭总收入	0.0296***		
	（0.0051）		
家庭债务收入比		−0.0343	
		（0.0263）	
家庭住房债务收入比			−0.3787**
			（0.1922）
家庭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省份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F*值	8.6247	5.0297	5.2908
组内R^2	0.0179	0.0018	0.0018
N	40681	39374	39379

数据来源：2016年、2018年、2020年、2022年CFPS数据。

注：括号内数值为聚类到家庭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平均年龄、家庭户籍、家庭是否有少儿；省份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GDP、就业率、产业结构。

从宏观层面看，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显著的周期放大效应。相关研究表明，在经济上行期，信贷条件放松与房价上涨相互强化，推动居民部门持续加杠杆，债务扩张与资产价格上涨之间会形成正反馈循环（宁磊等，2024）。但在金融周期下行阶段，房价回落与收入预期转弱将共同压缩家庭资产负债表空间，尤其是高负债家庭的消费受债务约束更为显著（Teulings et al.，2023）。因此，家庭债务在上行期对消费的拉动有限，而在下行期对消费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不仅通过居民去杠杆压缩总需求，而且还会通过房地产价格调整进一步挤出企业信贷，对投资产生负向影响，加剧经济衰退风险（Mian et al.，

2017）。另外，家庭债务风险还会改变宏观政策的传导效果。相关研究揭示，在高居民负债率环境下，财政扩张未必会提高消费需求，住房贷款压力、信贷约束和预防性储蓄会共同削弱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同时，住房消费与一般消费品对财政冲击的反应在不同债务水平下呈现明显分化（王燕武等，2020）。再者，货币政策影响同样具有时滞效应和非对称性。短期降息能减轻偿债负担并释放部分消费能力，但长期低利率环境反而可能强化住房投资偏好，进而挤压总体消费（宁磊等，2024）。因此，家庭债务治理不仅要控制债务总量，更应着力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通过债务收入比等宏观审慎工具约束居民过度加杠杆，防止消费贷、经营贷等绕道流入房地产市场和投机性领域（孟宪春，2023）。综上所述，只有当居民债务回归消费平滑而非资产投机功能，才能在修复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过程中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2.住房的财富效应

住房是居民家庭最重要的耐用消费品之一，也是中国家庭资产负债表中占比最高的资产类型。与一般金融资产不同，住房资产兼具消费品、投资品和抵押品属性，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非单一的财富效应，而是财富增值、债务负担、流动性约束和预期调整共同作用的结果（Dong et al.，2017；Waxman et al.，2020）。对国外成熟住房市场，房价上涨可提升居民住房净值，通过抵押融资、财富预期改善和信用约束放松拉动居民消费（Atalay et al.，2016）；但房价下跌引发的住房财富缩水也会抑制消费，其中，住房抵押品价值缩水带来的信贷约束收紧使得低收入、高杠杆且高边际消费倾向的家庭消费收缩更为剧烈（Mian et al.，2013）。从家庭异质性来看，房价上涨对消费的冲击存在明显分化。对已有住房且杠杆水平较低的家庭，房价上涨会激发其投资性购房需求，进而减少当期消费支出；对于无房家庭、改善型购房家庭和高杠杆家庭，房价上涨会抬高其购房门槛，加大首付储备压力和未来偿债负担，进而挤压家庭的非住房消费空间（Waxman et al.，2020）。房价上涨的消费效应还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其主要取决于房价收入比和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在房价收入比处于低位、金融市场更为成熟的区域，房产增值的微弱财富效应更易释放，对消费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当房价收入比突破临界阈值，购房成本和偿债压力占据主导，房价上涨会引发替代效应和挤出效应，由此抑制居民消费（Dong et al.，2017）。由信贷扩张和投资需求推动的房价上涨，还会加剧家庭债务累积和消费挤出；而由收入增加和真实居住需求支撑的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冲击则相对温和（孟宪春，2023）。

进一步地，住房制度安排也会影响住房财富效应能否从资产增值转化为消费改善。研究表明，公积金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和租赁市场改革等，都会通过改变住房成本、居住预期和流动性约束影响家庭消费。其中，住房公积金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呈现显著异质性，其仅对有房无贷家庭的消费具有明显促进效应，对无房家庭和有贷家庭则作用有限（康书隆等，2017a）。发展租赁市场和完善住房保障可通过降低居住成本直接释放非住房消费。同时，租金下调、公租房供给及租购并举等制度安排，也能够缓解租房家庭和流动人口的居住压力，提高家庭非住房消费（刘守英等，2025）。

综上，住房财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仍存在一定分歧。住房财富效应不等同于房价上涨带来的消费扩张，住房资产流动性与家庭资产负债状况决定了住房增值能否转化为可支配现金流；若房价上涨同时推高购房储蓄和偿债压力，则会挤出家庭消费。故从扩大居民消费的角度看，相关政策应重点降低住房支出对家庭现金流的占用，弱化住房的投资属性，通过优化住房金融支持、租购并举、住房保障、合理配置土地供给和稳定住房预期，推动住房回归居住功能，进而释放被住房负担挤压的消费潜力。

四、保障：从兜底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保障既是居民应对养老、医疗、失业等不确定性风险的制度安排，也是影响家庭储蓄动机、消费预期和代际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现有国内外研究主要从社会保障的风险分担功能、人口转变对社会保障影响两个维度探讨了社会保障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路径。

1.经济风险分担功能

早期经典研究主要关注养老保险与私人储蓄之间的替代关系。最初，Feldstein（1974）提出“社会保障财富”概念，将未来养老金权益视为家庭隐性

财富，指出预期的养老金可替代部分储蓄，进而促进当期消费。Hubbard et al.（1995）等学者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共社会保障的兜底保障可降低家庭在未来收入、健康支出和就业等方面的不确定性风险，进而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家庭当期消费倾向。

从不同类别的社会保障来看，对医疗保障，相关研究表明医疗保障的消费促进效应相对明确。疾病风险具有突发性和高支出特征，因而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为降低未来医疗支出不确定性，减少家庭为应对疾病冲击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研究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居民医保整合能够降低家庭医疗风险暴露，提升非医疗消费需求，尤其在低收入、健康状况较差和农村家庭中作用更为明显（Chen et al.，2022）。大病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等补充保障则可进一步缓解重大疾病和失能照护带来的财务压力，通过降低预防性储蓄、减轻子女照料负担和改善家庭风险预期等渠道，推动家庭非医疗消费增长和消费结构升级（Liu et al.，2023）。另外，养老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对复杂。根据全生命周期变化规律，养老保险能够提高居民退休后收入的确定性，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相关研究也表明，养老保险能够增强居民收入预期、改善健康状况，尤其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促进效应更强（周广肃等，2020；Huang et al.，2021）。但养老保险同时还具有缴费约束和制度预期效应，这可能会对居民消费产生负向影响，尤其是低收入群体。低收入家庭则容易因缴费压力和信贷约束而难以释放消费（康书隆等，2017b）。失业冲击具有突发性和即时性，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快速下滑。失业保险通过向高边际消费倾向的失业群体定向转移收入，在微观层面能够缓解失业者收入骤降的压力，发挥稳定总需求、熨平周期波动的关键作用（Kekre，2023）。从政策效应来看，适度提高失业金待遇并不会显著抑制失业者的再就业意愿，反而能够有效缓解失业者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家庭增加发展型消费支出和人力资本投入（谢强等，2024）。

此外，由于社保缴费负担在不同收入群体间分布不均衡，相关研究表明，适度降低社保缴费率、优化缴费基数核定机制，不仅能通过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改善就业结构和劳动收入预期，而且也有助于减轻低收入家庭缴费负担，缩小消费差距（徐舒等，2023）。

2.人口转变的需求侧影响

社会保障支出与人口基数密切相关，人口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时，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可抵消少子化对代际赡养能力的不利影响，缓释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的运行压力（张桂文等，2021；陈武元等，2024）。在老龄化深化趋势下，预期寿命增加会拉长教育与技能投资的回报期，老龄劳动者的知识和经验可通过“干中学”机制传导至年轻劳动者，有助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张桂文等，2021）。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需求侧，老年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见图3）。对老年抚养比较高的国家，居民消费率整体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中国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在老年抚养比上升过程中，居民消费率相对偏低。当养老、医疗和长期护理保障不足时，寿命延长、医疗支出不确定性和失能照护风险则会强化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使居民倾向于压缩当期消费，进一步降低消费倾向（De Nardi et al.，2010）。在供给侧，老年抚养比较高的经济体通常伴随较高的社会支出占GDP比重，社会保障体系会随着人口结构转变而面临持续扩容压力。从数据对比分析来看，与多数高老年抚养比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的社会支出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见图4）。另外，延迟退休、强化缴费与待遇关联、优化养老金替代率等举措，也是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的国际经验（Vogel et al.，2017）。

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来看，人口结构转变要求社会保障在生育支持与养老保障之间形成代际协同，即将儿童养育、劳动供给和老年赡养纳入家庭全生命周期资源配置的统一框架。相关研究表明，生育支持应加强对养育成本的持续性和结构性补偿，通过普惠托育、学前教育、课后照护、儿童医疗营养和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减轻育龄家庭在时间、教育和照护上的负担，缓解生育对家庭消费和劳动供给的挤出效应（Rindfuss et al.，2010）。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时间资源在育儿、就业和养老之间具有明显替代关系，养老保障应与长期护理、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和家庭照护支持相衔接（Liu et al.，2023；Chen et al.，2024）。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融合，不仅可以减轻中青年家庭赡养压力，也能强化家庭内部代际照护支持，降低育龄家庭子女照料的时间成本，缓解赡养压力对消费与生育决策的抑制效应（曹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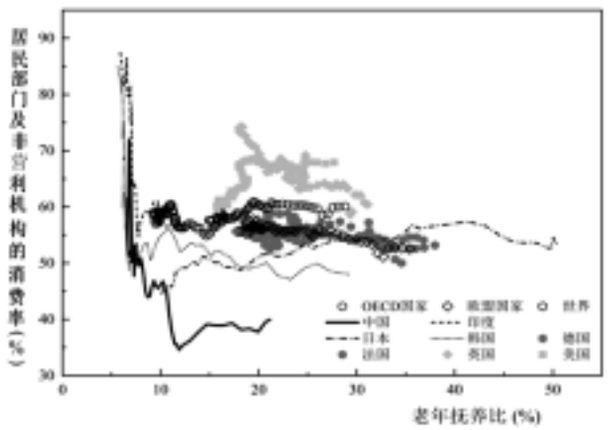


图3　1960—2025年部分国家和地区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及非营利机构的消费率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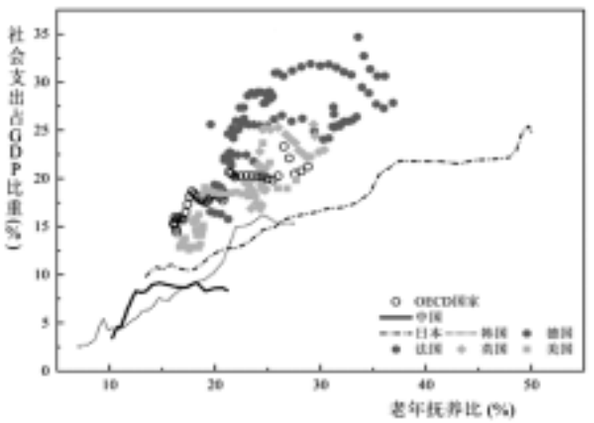


图4　1980—2024年部分国家和地区老年抚养比与社会支出占GDP比重关系

数据来源：OECD数据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提取时间为2026年7月1日。

注：老年抚养比指65岁及以上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OECD社会支出包括现金福利、医疗与教育等直接服务以及具有社会性质的税收减免。由于OECD数据库未提供中国数据，为提高指标的可比性，本文以《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之和衡量中国社会支出；其中，住房保障支出自2009年起统计，故2000—2008年仅包括前三项。

等，2023）。综上所述，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分担家庭风险、降低预防性储蓄并稳定消费预期，是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的重要领域之一。

五、供给：数字技术、空间集聚与消费场景创新

扩大消费不仅取决于居民收入和消费倾向，而且也取决于供给体系能否有效支撑、创造并匹配居民需求。近期相关国内外研究主要从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空间集聚与市场规模、消费场景创新三个维度系统探究了优化消费供给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路径。

1.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发展从供给侧为提振居民消费提供了新的机制，其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居民消费便利性和供需匹配效率，将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相关研究表明，数字零售突破了传统线下渠道的地理约束，降低了居民消费参与门槛，使消费敏感型、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容易进入数字消费市场（刘向东等，2025）。数字金融则从支付便利化和信贷可得性两方面强化了数字经济的消费促进效应。其中，移动支付降低了交易摩擦和支付成本，数字信贷则通过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缓解部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从金融普惠的典型事实来看，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③]（郭峰等，2020），2011—2023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整体明显提高，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空间特征。由图5可知，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始终保持领先，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数字金融普惠水平差距逐步缩小。进一步地，由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的关系可知，省份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数字普惠金融水平较高的地区通常具有更高的居民消费水平（见图6）。

从已有研究来看，首先，数字金融的消费促进效应也存在边界，当数字信贷扩张超过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和偿付能力时，违约风险和债务偿付压力将削弱消费增长的可持续性（易行健等，2018）。其次，数字金融资源在城乡、地区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布不均衡，数字接入能力、金融素养和平台使用能力差异可能形成新的数字鸿沟，使数字金融的消费促进效应存在分化现象（易行健等，2018；Yang et al.，2022）。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人工智能通过生产智能化、技术迭代和资源配置优化，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并提升服务效率，推动资本和要素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部门，减轻住房和基建资本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林晨等，2020）。最后，人工智能还可催生智能家居、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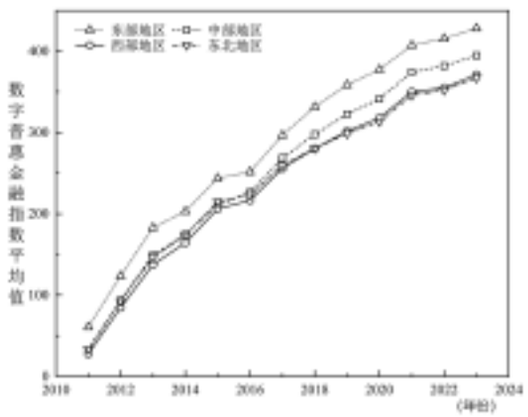


图5 2011—2023年不同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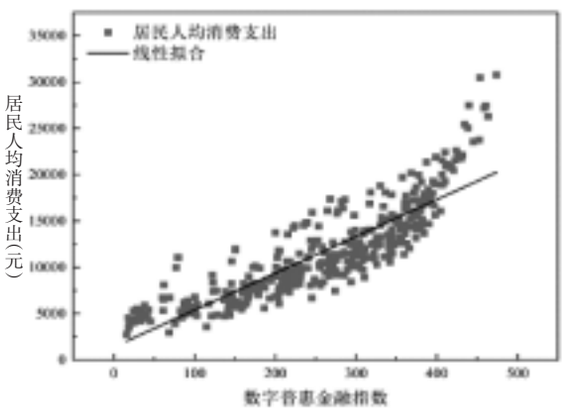


图6 2011—2023年不同省份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关系

数据来源: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自2011—2023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取时间为2026年7月1日。

慧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消费场景,拓展居民消费空间。但自动化和算法替代可能改变劳动需求结构,使部分从事常规性、重复性工作的劳动者面临收入下降和就业不确定性,进而抑制这部分群体的消费能力;若技术收益更多集中于资本所有者、高技能劳动者和平台企业,还可能通过收入分化削弱居民消费扩张的普惠性(Acemoglu et al.,2018)。

2.空间集聚与市场规模

城市既是产业集聚的生产载体,也是消费供给、生活服务等高度集中的核心空间载体。区位理论已从市场范围、距离成本和商业设施布局等角度揭示了空间结构对消费可达性的影响。新经济地理学表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市场临近性会推动企业与消费者向大市场集聚,形成生产集聚与本地需求扩张之间的循环累积效应(Krugman,1991)。

从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来看,现有研究主要揭示了人口集聚的经济效益、空间紧凑性、市场规模的需求效应以及商业设施布局的供给效应四条作用路径。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工资和生产率,也来自餐饮、教育、公共服务等消费便利性和文化多样性,进而也会形成"消费城市"(Glaeser et al.,2001)。相关研究表明,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可依托本地市场需求优势,支撑更多商品品类与供给多样性,显著提升居民商品可得性与消费选择空间,形成规模经济效应(Krugman,1991;Handbury et al.,2015)。另外,城市空间紧凑性影响消费的机制主要体现在消费可达性。仓储共享、集中配送等物流组织形式在规模经济下还可改善物流时效性,有助于生鲜等时效敏感型商品进入线上消费场景(李涵等,2023),缩短居民到达商业设施和生活服务网点的时间和距离,通过降低通勤成本提高消费发生的频率(Allen et al.,2022;彭冲等,2023)。但城市空间集聚并非越强越好,城市密度提升既会带来市场规模扩大和服务供给改善的集聚收益,也存在地租上升、通勤拥堵和空间竞争加剧等集聚成本(Brinkman,2016),导致供给效率下降和业态结构单一,反而降低居民消费选择与服务供给质量(张齐圣等,2025),进而降低社会联结与消费便捷性,抑制居民消费(邓慧慧等,2024)。综上,只有当空间密度与公共交通、商业网点、生活服务与数字物流体系相匹配时,人口集聚和空间密度方可转化为更高的消费可达性与更丰富的消费选择,进而有效促进居民消费扩张与消费结构升级。

3.消费场景创新与消费

居民消费总是嵌入进具体场景之中的,消费场景创新是以供给创新创造需求的直接体现,其通过重塑消费发生的空间、时间与交易方式,降低居民潜在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的参与成本。从场景创新的载体来看,基础设施建设与平台型新业态构成了两类相互补充的影响机制。道路、高铁等交通设施通过压缩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扩大居民出行半径,提高消费场所可达性,在更大范围内促进消费匹配和福利改善(Allen et al.,2022)。共享出行、即时零售与外卖平台则进一步将消费场景从线下到

店拓展为线上匹配、即时配送与到家服务，通过节约等待时间、降低短途出行成本、改善消费体验和增强平台信任，提高居民消费参与率（Xu et al.，2021；陈勇吏等，2024；刘向东等，2025）。另一方面，人口结构转变要求消费场景从中心化商业空间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场景延伸。随着老龄化、少子化和家庭小型化加深，健康医疗、长期护理、社区养老、普惠托育、亲子休闲和适老化服务等服务领域消费需求逐步增大（De Nardi et al.，2010；杨继生等，2021）。从不同类型的需求来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不仅能缓解家庭照护约束，而且还能提高中老年家庭的非耐用品消费水平（Chen et al.，2024）。对育儿家庭而言，提高托育服务可及性可以缓解子女照料的时间约束，提升家庭服务消费参与度（Rindfuss et al.，2010）。综上，消费供给的提质升级为居民消费需求提供了现实载体，增强了增收和减负释放的购买力以及社会保障的消费预期效应。

六、政策启示与研究展望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④]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增收—减负—保障—供给”的综合分析框架，系统梳理了居民消费的主要研究脉络与作用机制。从收入分配、家庭资产负债表、社会保障制度、人口结构转变以及消费供给体系等维度，对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文献梳理和事实分析。根据已有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加强产业发展和就业带动协同，将高质量充分就业贯穿产业发展和转型全过程，在扩大岗位供给的同时，健全人力资源供需匹配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就业支持和公共服务体系，重点保障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快制订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提升低收入群体收入；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完善农村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和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制度，提高农民实际收益；强化民生导向的再分配调节作用，进一步深化个税改革，扩大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进一步提高扣除标准，探索将家庭养老和生育照护、托育服务、青年发展型技能培训等纳入扣除范围，同时，提升多孩家庭税收减免力度，提高无房青年住房租金扣除标准；完善经营性收入保障机制，持续优化创新创业支持政策，重点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新个体经济，进一步打造“名特优新”小店；对高技术产业，健全创新创业成果利益分配机制，逐步完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的技术入股和成果分红等创新收益共享机制。

第二，聚焦居民减负纾困，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逐步下降，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已降至59.87%[⑤]，但居民贷款尤其是住房贷款规模仍然较大，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仍高达37.01万亿元，约占住户贷款总额的44.4%[⑥]。与政府债务类似，居民家庭债务过高也具有较高风险，不仅制约家庭消费能力，而且还挤占人力资本投入等发展型消费支出，需围绕“十五五”时期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进一步推动家庭资产负债表修复，遏制居民部门非必要杠杆过快上升。持续动态优化住房金融政策，进一步推动存量房贷利率下调，降低家庭房贷压力；完善差异化房贷利率体系，进一步优化首套房贷利率，加大对多子女家庭购房利率优惠补贴力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立足城市间人口流动趋势、住房库存与居住需求结构，因城施策优化土地供给结构，动态调整住宅用地供应规模、节奏与结构，在人口流入重点城市适度增加保障性住房与改善型住房用地供给；同步清理住房消费不合理限制性措施，优化住房交易税费政策，降低住房置换、存量房交易环节的税费负担，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

第三，持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消费预期。国内外研究表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增强消费信心，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十五五”时期人口结构深入变化，对社会保障需求提出更高要求。要以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和推进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为重点，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加强多层次医疗保障，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更好满足不同群体的保障需求。提升全国统一社保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效能，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机制。落实好健全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社

保制度的工作部署，健全分层分类社保减负机制，延续实施社保阶段性降费率、缓缴政策，针对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新业态人员实施差异化阶梯缴费补贴，按收入水平、困难程度梯度分担个人缴费成本，逐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当期缴费负担，提高农民工及灵活就业人员等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

第四，立足投资于人的重点领域，不断完善促进消费长效制度机制。“十五五”时期，人口结构转变将深刻影响居民消费结构，服务消费成为扩大内需、增进民生福祉的核心增长点。要聚焦居民全生命周期民生需求，围绕社区化服务需求，推动社区小店融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服务消费可及性，发展家政服务、社区养老、托育托管、便民维修等业态，加快构建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强化人工智能对消费升级的支撑作用，以技术创新优化消费供给结构，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文娱、医疗、文旅服务等领域深度融合应用，培育壮大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持续清理汽车、住房等重点领域不合理消费限制性措施，破除制约消费潜力释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全面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推行错峰休假、弹性调休，充分释放居民消费的时间潜力。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聚焦预付式消费、线上消费、民生服务消费等重点领域，健全跨部门消费维权工作机制，有力营造安全放心、公平有序的消费市场环境。

未来研究可在以下领域进一步拓展：其一，需更为细致地考察收入向消费的转化条件，区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消费效应，尤其要关注灵活就业等非正规就业扩张背景下收入不稳定性对预防性储蓄的影响。其二，应进一步从家庭资产负债表约束出发，理解居民消费不足的内在原因，重点区分住房债务、消费债务、经营债务等负债形式，准确识别偿债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房价预期如何影响家庭消费。其三，社会保障研究不能仅关注社会保障标准提升的消费促进效应，还应同时考虑缴费负担、保障收益、代际分担和制度可持续性的净效应，特别是对低收入家庭、农民工、灵活就业者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影响。其四，人口结构转变下的消费研究需更加聚焦家庭内部，重点考察育儿、教育、养老、医疗和照护等如何共同改变家庭资源配置，尤其应加强对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社区照护和适老化消费场景等消费新需求的研究。

注释

①习近平：《扩大内需是战略之举》，《求是》2025年第24期。②王昌林：《以提振消费为重点全方位扩大内需》，《求是》2025年第5期。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可参见：https://idf.pku.edu.cn/zsbz/bjdxszphjrzs/index.htm。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14页。⑤数据来源：Wind，2026年1月28日查询。⑥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四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2026年1月27日，https://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20260127150002805 33/index.html。

参考文献

[1] Acemoglu D, Restrepo P. The race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Implications of technology for growth, factor shares, and employ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8, 108(6):1488-1542.

[2] Allen T, Arkolakis C.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mprovement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2, 89(6):2911-2957.

[3] Atalay K, Whelan S, Yates J. House prices, wealth and consumption: New evidence from Australia and Canada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016, 62(1):69-91.

[4] Becker G S. A theory of the allocation of time[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299):493-517.

[5] Bhaduri A, Marglin S. Unemployment and the real wage: The economic basis for contesting political ideologies[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4(4):375-393.

[6] Blundell R, Pistaferri L, Saporta-Eksten I.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family labor suppl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2):387-435.

[7] Brinkman J C. Congestion, agglomer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cities[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6, 94:13-31.

[8] Chen H, Ding Y, Tang L, et al. Impact of urban-rural medical insurance integration on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2, 76:837-851.

[9] Chen R, Jiang Y, Li X. Community-based elderly home care services policy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enhanc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 96:103620.

[10] Davig T, Leeper E M. Monetary-fiscal policy interactions and fiscal stimulu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1, 55(2):211-227.

[11] De Nardi M, French E, Jones J B. Why do the elderly

save? The role of medical expens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0, 118(1):39-75.
[12] Dong Z, Hui E C M, Jia S H. How does housing price affect consumption in China: Wealth effect or substitution effect?[J]. Cities, 2017, 64:1-8.
[13] Duesenber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14] Feldstein M S.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4, 82(5):905-926.
[15] 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16] Glaeser E L, Kolko J, Saiz A. Consumer c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1, 1(1):27-50.
[17] Hall R E. Stocha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 cycle-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8, 86(6):971-987.
[18] Handbury J, Weinstein D E. Goods prices and availability in citi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15, 82(1):258-296.
[19] Huang W, Zhang C. The power of social pen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s new rural pension scheme [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21, 13(2):179-205.
[20] Hubbard R G, Skinner J, Zeldes S P. Precautionary saving and social insurance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2):360-399.
[21] Kaplan G, Violante G L, Weidner J. The wealthy hand-to-mouth [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2014,45(1):77-138.
[22] Kekre R. Unemployment insurance in macroeconomic stabilizatio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23, 90(5): 2439-2480.
[23] 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M]. London: Macmillan, 1936.
[24]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3): 483-499.
[25] Liu H, Ma J, Zhao L. Public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and consumption of elderly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23, 90: 102759.
[26] Mian A, Rao K, Sufi A. Household balance sheets, consumption, and the economic slump[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3, 128(4):1687-1726.
[27] Mian A, Sufi A, Verner E. Household debt and business cycles worldwide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7, 132(4):1755-1817.
[28] Modigliani F, Brumberg R. Utility analysis and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cross-section data[M/OL]//Kurihara K. Post-Keynesian economic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388-436.
[29] Rindfuss R R, Guilkey D K, Morgan S P, et al. Child-care availability and fertility in Norway [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010, 36(4):725-748.
[30] Saez E, Slemrod J, Giertz S H. The elasticity of taxable income with respect to marginal tax rates: A cri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2, 50(1): 3-50.
[31] Teulings R, Wouterse B, Ji K. Disentangling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debt on consumption [J]. Empirical Economics, 2023, 65(5):2213-2239.
[32] Vogel E, Ludwig A, Börsch-supan A. Aging and pension reform: Extending the retirement age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J]. Journal of Pension Economics & Finance, 2017, 16(1):81-107.
[33] Waxman A, Liang Y, Li S, et al. Tightening belts to buy a home: Consumption responses to rising housing prices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20, 115:103190.
[34] Xu X, Yan N, Tong T. Longer waiting, more cancellation?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n on-demand service platform [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1, 126:162-169.
[35] Yang T, Zhang X. FinTech adoption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22, 145:106668.
[36]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27-41.
[37]曹伟,刘桂岭,曾利飞,等.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2023(3):172-190.
[38]陈武元,陈祎,蔡庆丰.社会少子化,刘易斯拐点与家庭教育投资:基于资源再配置的研究视角[J].教育研究,2024(10):121-136.
[39]陈勇吏,朱喜,李经,等.共享单车促进了居民消费吗?[J].经济学(季刊),2024(4):1139-1155.
[40]邓慧慧,曾庆阁,张三峰,等.城市空间形态如何影响居民消费[J].财贸经济,2024(7):130-146.
[41]范子英,池雨乐.新个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为何不高?:以专项附加扣除为例[J].管理世界,2026(1):1-23.
[42]方福前.中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原因研究:基于中国城乡分省数据[J].中国社会科学,2009(2):68-82+205-206.
[43]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4):1401-1418.
[44]康书隆,余海跃,王志强.基本养老保险与城镇家庭

消费：基于借贷约束视角的分析[J].世界经济，2017a(12)：165-188.
[45]康书隆，余海跃，刘越飞.住房公积金，购房信贷与家庭消费：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7b(8)：67-82.
[46]雷潇雨，龚六堂.城镇化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4(6)：44-57.
[47]李涵，冷萱.超大规模市场，物流效率与线上消费[J].经济研究，2023(11)：190-208.
[48]林晨，陈小亮，陈伟泽，等.人工智能，经济增长与居民消费改善：资本结构优化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2)：61-83.
[49]刘娜，李静，张川川.被时间束缚的消费：工作时长对居民消费的影响[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5(9)：29-51.
[50]刘守英，李昊泽，孙浦阳.住房租赁制度改革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基于2017年"租购并举"政策的经验研究[J].经济研究，2025(8)：50-71.
[51]刘向东，何明钦.数字零售能否改善城乡消费不平等：基于典型平台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25(5)：60-80.
[52]孟宪春.房价对家庭债务和财富分布的影响：理论机制与应对策略[J].经济研究，2023(4)：171-189.
[53]宁磊，王敬博，李文杰.消费刺激还是债务积压：房贷利率政策的时长依赖性[J].中国工业经济，2024(10)：24-42.
[54]彭冲，韩立彬，岑燕.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消费多样性：街区大数据视角[J].世界经济，2023(12)：64-91.
[55]王曦，温瑞昌，汪玲.异质性家庭，消费品结构与消费刺激政策效果[J].中国工业经济，2024(10)：5-23.
[56]王燕武，李文溥.居民负债压力下的财政政策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28-46.
[57]谢强，唐珏，吕思诺，等.失业保险，流动性约束及家庭消费[J].经济学(季刊)，2024(2)：481-498.
[58]徐润，陈斌开.个人所得税改革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吗?：来自2011年所得税改革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5(11)：80-97.
[59]徐舒，廖健伶，徐嘉珧.累退社会保险缴费率，流动性约束与低收入家庭消费[J].中国工业经济，2023(3)：133-151.
[60]杨继生，邹建文.人口老龄化，老年人消费及其结构异质性：基于时变消费效用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21(11)：91-110.
[61]杨汝岱，朱诗娥.公平与效率不可兼得吗?：基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7(12)：46-58.
[62]姚健，臧旭恒，周博文.中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异质性与消费潜力释放：基于家庭信贷和资产配置视角的分析[J].经济学动态，2022(8)：45-60.
[63]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64]翟光宇，薛严慨，李静怡.新一轮个税改革与居民消费潜能：基于综合课征和专项附加扣除的研究[J].金融研究，2025(6)：39-57.
[65]张桂文，邓晶晶，张帆.中国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21(4)：33-44+126-127.
[66]张齐圣，王雅琳.商业设施，消费空间与内需拉动[J].经济研究，2025(9)：68-88.
[67]周广肃，张玄逸，贾珅，等.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消费不平等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20(4)：1467-1490.

Research Progres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Deng Zhongliang　Yuan Shiqi

Abstract: Vigorously boosting consumption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task for building a strong domestic market and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during the 15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ased on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by household consump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trajectory and recent progress in China and abroad from four dimensions: increasing income, reducing burdens, strengthening social protection, and improving suppl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labor remuner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ime constraints, and fiscal and tax arrangements affect households' basic consumption capacity, while housing-related debt and changes in house-price expectations further influence households' effective purchasing power.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demographic structural changes such as population aging and declining fertility, an improv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vering medical care, old-age support,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nd long-term care could significantly weaken the motivation for precautionary savings and improve households'consumption expectations. Along with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nhancing the accessibility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optimizing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can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improve consumption convenience.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cultivated new consumption scenarios and, by expanding consumption supply, further amplified the scale effect of potential markets. Therefore, insufficient household consumption is not simply a problem of inadequate purchasing power or sluggish willingness to consume; rather, it is the result of the joint influenc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debt pressure, risk expectations,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the matching between consumption supply and demand.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further propose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possibl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Household Consumption;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ocial Security; Consumption Supply

（责任编辑：江　夏）